

“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旭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2017年9月19日至20日,“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承办。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房锐教授主持,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刘跃进、四川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刘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唐普先后致辞。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当代文坛》编辑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单位的8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一 南方丝绸之路文献整理与研究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文本抒写与南方丝绸之路之关系》认为,《天子游猎赋》中记载的珍奇异物,既有可能来自传统的“丝绸之路”,也有可能来自南方丝绸之路。马庆洲(清华大学出版社)《作为使节的司马相如——论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中的贡献》认为,司马相如不仅是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积极拥护者,而且奉节出使,略定西夷,为汉代经营西南做出了贡献。马旭(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论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贡献》指出,司马相如通西南夷,打通了从成都连接西南夷通往境外的交通古道,促进了这条要道上的商业贸易发展。周及徐(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西汉通西南夷的几个问题及通西南夷大事年表》对唐蒙通南夷和治南夷道的时间及路线、唐蒙和司马相如的头衔、夜郎与汉通后迟滞二十三年才归降的原因等进行考察,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将结果整理为《西汉通西南夷大事年表》。刘晓凤(《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杜甫与南方丝绸之路》认为,杜甫的蜀中诗记录了成都繁华的生活、繁忙的水路交通、蜀地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来自异域

的珍贵物品等,这些诗歌是南方丝绸之路强大生命力的注脚。范春义(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夷风土记〉与西南丝路研究》从关注经济文化交流的羁縻视角、他者文化阐释的在地视角与器物交流的私生活三个方面入手,对《西南夷风土记》进行解读,指出此书是研究明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基本典籍。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南丝路与西南夷的首长贸易》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夷各族群之间贸易往来最为直接的载体,是成为西南地区的首长贸易网络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林科(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哀牢”述略》介绍了哀牢的名称、地域、族群及物产,指出哀牢是“蜀身毒道”上直接联通中印两大古文明的“宜径”。康扎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话语的分割:南丝路与茶马古道及其关系》介绍了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关系。冷茵莎、汤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茉莉来华路线考》纠正了学界对茉莉原产地为大秦、波斯、越南等的说法,认为茉莉沿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杨兴涓、李延芳(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蜀地樵茶在北宋后期治边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指出,北宋后期利用茶马贸易等经济手段,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及少数民族控制的策略,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吴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谱牒文献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价值》以《西南彝志》、《保氏族谱》、《五云董氏家乘》等为例,指出谱牒文献在考察南方丝绸之路人口迁徙、民族交流、宗教信仰变化、交通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余江(天津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南方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作用与意义、重要节点城市三个方面入手,指出南方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 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研究

李国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生态边界与族群归类:华夏西南边缘的推移与定型》指出,华夏西南边缘内外的人群共同创造了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也开创了今日中国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现实。房锐(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韦皋与〈南诏奉圣乐〉〈骠国乐〉》对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进献《南诏奉圣乐》、《骠国乐》的始末及其影响

进行了探讨。多洛肯(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明清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研究——以彝族、白族、纳西族为例》指出,明清时期,在对唐诗的接受与学习中,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进一步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杨慎对南丝绸之路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贡献及其价值》指出,杨慎具有通达的民族文化观念,能广泛结交西南各族友人,细致描绘西南山川风物民俗风情,并在西南文化学术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杨静(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丝绸之路散居族群民间文学的现代传承及文化价值初探——以四川德昌傈僳族口头文学为例》将研究视野聚焦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散居族群上,对凉山州德昌县傈僳族口头文学中呈现出来的独特文化价值进行梳理,指出其在非遗保护语境下研究与传承的意义。

三 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论巴蜀艺术形式与近东古文明的关系》对偶像式构图与情节式构图艺术形式的来源、巴蜀文化中的“英雄擒兽”母题、巴蜀巳形纹饰的来源、神树崇拜等方面进行阐述,指出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间文化交流的路线则是南方丝绸之路。祁和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对“蜀·身毒道”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介绍。李桂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交流》对中印文化交流进行考察,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是汉文化在境外传播的重要路径。颜信(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古时期西南地区出土琥珀制品及其来源路径》指出,中古时期西南地区出现的大量琥珀制品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的,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地区各种外来物资和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王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至唐代时缅甸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认为,缅甸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枢纽,魏晋至唐代,这条古代交通要道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凯(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雒人”及其南迁》分析雒人南迁轨迹,指出雒人南迁之路正是成都通往越南的交通道路。郑小琼(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论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天竺僧人对唐诗的影响》指出,天竺僧人对唐诗的题材、主题方面有所影响。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丝绸摇篮与天府文化》指出,天府成都在丝绸之路贸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蜀锦、蜀绣、蜀布等特色商品的输出,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是道教传入东南亚地

区最为重要的载体。

四 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其他研究

伏俊琰、邵小龙(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略论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建》指出,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是“前丝绸之路”时期的文化交流,对此展开的研究亦是“前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序》认为,论文集《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涉及历史、宗教、文学、音乐、美术、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收集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丰富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为后来学者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众多的文献资料。钟仕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对敦煌写本《文选》俄藏本和法藏本进行介绍,指出这两种写本虽为残卷,但其原文和注释与今本有异,较之现存各本的李善注和五臣注,兼有二者之长,可订正今本《文选》的某些伪误,补充《文选》的正文和李善注、五臣注的校释,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刘康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杜甫〈投简成(一作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系年辨证》认为,此诗诗题当作《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二县”指成都府附郭之成都、华阳二县,此诗应为乾元三年(760)正月初杜甫初来成都,向成华两县诸子寻求接济所作。张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试论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对佛教普贤道场的形成进行了考证,指出峨眉山在东汉、晋朝和宋代成为普贤道场的三种观点皆有不当之处,中土最早的普贤道场在北岳恒山。吴华峰(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清代乾嘉时期的伊犁诗坛》指出,伊犁诗坛是边塞文人联络情感与砥砺精神的支柱,也是沟通边塞与中原文化的桥梁。周燕玲(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老来无梦到西湖,却画天山雪猎图”——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认为,清代西域诗作中有浓浓的江南情结,这种江南情结在边疆地区强化了国家观念与王朝意识,强化了大一统的地缘结构秩序,在根本上牢固树立了边疆地区的“中国观念”。杨冬燕(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浅论藏族生境与生态意识》指出,藏族文化中生态保护的意识理念及文化实践,对青藏高原的保护有重要意义。黄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高丽斋醮研究》认为,宋朝礼制文化的传播进入高丽,促成了高丽斋醮的繁荣。张建伟(山西大学文学院)《论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团体》指出,安南诗人团体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元朝使臣的唱和是中越文化交流的见证。任子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库姆孜拔弦手法的衍变及传播》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柯尔克孜族的音乐文化交流进行介绍,指出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能仅从书本出发,更应该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补足历史文献对偏远地区记载较少的缺憾,展示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活态样貌。

[责任编辑:唐 普]